

深情“还学于民”，一生“志在富民”

纪念费孝通诞辰 110 周年,重温费老一生的情怀与梦想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也就是还学问于人民。他践行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

他总是不忘故乡的恩赐，在《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的开篇就言道：“初访江村是我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标。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

“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日子子孙……”

刘豪兴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 110 周年。回溯费先生的一生，他的学习、工作、学术和生命深深扎根在祖国大地，将劳动、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彰显着深厚的乡土情怀。

从实求知，志在富民

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江村）是费孝通的成名之地。1923 年春，他的姐姐费达生和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的同事在校长郑群雍带领下，在开弦弓村进行“土种革命”，指导科学养蚕和缂丝，获得好收成，农户增加了收入。随后，费达生将机械引入农村，创办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破天荒地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经济结构，造就了一个中国农村“挣工钱阶层”。

费孝通关注姐姐的为农事业，1933 年 10 月和 1934 年 5 月，以费达生名义发表了《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和《复兴丝业的先声》等文章，总结科技下乡和工业下乡的实践经验，开启了探寻农业社会跳跃工业社会，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矛盾，发展乡村工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1936 年夏天，他在姐姐费达生的安排下，利用去英国留学前的余暇到吴江开弦弓村养伤，并自觉地跨越“文野之别”，在自己熟悉的农村社区，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像大瑶山调查《桂行通讯》那样撰写《江村通讯》7 篇，在《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和《宇宙旬刊》上发表，给这个长江流域的开弦弓村取了“江村”学名，使之成名于世界。

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学习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采用江村调查资料完成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个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田野研究》，扉页中文名为《江村经济》），1939 年在英国出版，1986 年中文版《江村经济》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林诺斯基在序中给予高度评价：“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接着写道：“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民族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典范。”

费孝通这一跨越“文野之别”的学术成就开拓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新方向，从西方人类学家传统的异域田野调查转向东方文明、本乡本土的田野调查。费孝通的新见之所以被导师认可和夸奖，是适逢其时地实现了西方人类学家想做而未实践的变革。

《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一书，被西方许多大学列为社会学人类学的参考书；费孝通之后，人类学家改变过去固守异域研究的范式，研究文明民族，或研究自己的人民日渐增多。

费孝通多次说《江村经济》是他学术研究的起点、界标，这不仅是他社区研究的学术方向，而且他一生研究的诸多课题都在这里都已孕育。他没有想到，日后是否有机会重返故乡，进行追踪调查。他依依不舍地在《江村通讯·离乡》篇写道：“我离了我已发生了亲密感情的一村人民，将远远地离开了，我只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知识的源泉’，一片亟待开垦的原野。”这种乡土情怀的根已深深地扎在开弦弓的土地上，只要气候适宜即会发芽，继续开花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江村沦陷，音信断绝。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常常想去看望江村乡亲，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去成。1957 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他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帮助下，和姐姐费达生（时为江苏省人大代表）回到这个熟悉的村庄，乡亲们如兄弟姐妹一般欢迎姐弟俩，使他们“感动得



▲费孝通。 新华社资料片

眼睛发酸”。在浓浓的乡情氛围中，费孝通追踪调查 20 天后返京，调查组的其他同志继续调查。

是年 6 月，《新观察》第 11、12 期连载他的《重访江村》，在按语中说：“本文作者 21 年前访问江苏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著有《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出版。此次重到该村视察，看到这个村子 21 年来人民翻天覆地的变化，深为感动，并对当前农民生活进行详细调查，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的办法。”当时《人民日报》和《文汇报》等也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消息，也有类似的评价，可以说是媒体的一种共识。

费孝通在对比中，看到了江村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些犹疑的。”接着说：“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的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对的。”道路，即方向，障碍，即问题，二者是辩证的。只有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能直面并做出科学解释，引导社会前进。

费孝通“志在富民”，认为农业地区发展乡村工业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多种经营，发展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建议，“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吴江县人民委员会在向上级汇报费孝通这些建议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可是，第三篇文章尚未及发表，反右派运动开始了，费孝通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政治打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科学的春天来了，费孝通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委托，主持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1981 年 10 月，费孝通三访江村，迈开了行行重行行的新步伐。如同第二次重访江村时一样，78 岁的姐姐费达生陪同他“回乡探亲”，乡亲们无比热情地欢迎他们。

费孝通通过调查，发现开弦弓村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致的，但也有它的特点。近几年，开弦弓村的农、副、工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下乡，乡村工业比愈愈来愈大，由此农民收入迅速翻倍。费孝通几十年前发展乡士工业的主张在这里普遍施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而从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等，农民生活好了起来。他高兴地说：“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人生易老，世事沧桑，耳闻目睹江村的急速变化，费孝通心头有无限的感慨。3 个月后，他四访江村，在用社队工业利润盖起的荷花湾大队部楼上，分别为开弦弓大队书赠贺知章《回乡偶书》，为荷花湾大队书赠李绅《悯农（锄禾日当午）》，表达他对故乡的缅怀和隐晦久客他乡的事实，以及对劳动艰辛和劳动果实来之不易的告诫。

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实地调查，又从开弦弓村起步，这是历史的契合。“从实求知”，在开弦弓村这片原野上，他耕耘了近 70 年，将发展乡村工业、发展小城镇、增加农民收入等富民思想引向深入，不断扩展，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富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江村经济》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

1980 年 6 月 23 日，费孝通参加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提到要还两笔老账，写两本书的任务。一是他 1957 年许下的愿——写一本《新江村经济》，想再到江村调查一次，为后代留下

一本关于这个村子在半个世纪里变化的忠实记录。第二笔账是欠前妻的，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夙愿，写出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璠山社会结构方面的书。

前者是他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 1981 年赫胥黎纪念会上演讲时宣布的，希望在江村调查 50 周年时，将一本江村经济的续篇送到“在座的朋友们的手上”。为此，他组织江村 50 年调查组开展调查，直接指导。我是成员之一。因我们没有尽责，未能实现他晚年的最大心愿，协助写出《江村经济》的续篇《江村五十年》，失信于世界学界，留下了社会学发展史上的最大历史遗憾。我每每想起，都十分愧疚。

费孝通从小常在父亲费璞安的书房翻看方志类书籍，似懂非懂。在吴江第一初级小学读书时，特别喜欢听校长沈叔明（辛亥革命后改名沈天民）的“乡土志”课程。沈叔明家里很清苦，冬天棉衣总不够，但对他的学生非常好。费孝通感同身受，深情地回忆：“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背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神情。他会拍拍我的小脑袋，微微带着笑容问我一阵身体可好些了？原因是我这些年常常生病请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怪可怜的病娃娃。他对我的关心抚慰使我感到亲切温存，每一起想还是音容宛在。”

沈叔明的《乡土志》课程，自己编写，自己讲授，教育学生爱国、爱乡土、爱哺育自己成长的地方；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要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到处流浪。费孝通回忆说：“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乡亭的故事。至今我们每母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仍悠然在目，使我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乡土志”是地方志的一种，也记载着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等等。“乡土志”和地方志的知识和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费孝通的人生志向和学术道路。他认为，他日后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归功于沈叔明校长“乡土志”课程的启发。

他的学士论文《迎亲婚俗之研究》（1933 年）就是运用全国 170 余种县志、州志的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做资料完成的。他在《乡土教材和姻姻调查》中说，他的“《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如是，他的《江村经济》是很有创造性的现代“乡土志”，自成一体。

由此，我理解费孝通 1992 年题写的“修志读志用方志，识乡爱乡建家乡”的深远意义，感悟 1997 年 1 月和 2002 年 4 月他两次叮嘱我负责编纂《开弦弓村志》，是他《江村经济》续编的一种寄托。2010 年，当时的吴江市人民政府将编纂《开弦弓村志》列入纪念费孝通诞辰 100 周年项目，开弦弓村村民委员会成立《开弦弓村志》编纂小组，聘请我任主编主持编纂工作。经过 5 个春秋的共同努力，得以出版发行。实现费孝通编纂《开弦弓村志》的夙愿，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

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

1996 年 9 月 19 日，江村调查 60 周年时，费孝通送给家乡父老乡亲一份厚重的礼物——《爱我家乡》一书，表示他对他们育养之恩的报答。该书“卷前”辑录《先父遗稿——吴江光复前后回忆》《先母遗稿——〈女界钟·序〉》和《纪念姊丈旧作——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是对前辈的敬仰与怀念；以《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为代序，选自《江村经济》出版后在家乡追踪调查的《重访江村》（上）、《重访江村》（下）、《三访江村》《小城镇 大问题》《家乡的凤尾菇》《九访江村》《镇长们的苦恼》《江村五十年》《吴江行》《再访震泽》《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等“访问记”编辑成书。

费孝通怀着对家乡的深情，长期关注家乡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初，吴江有名的七大连刚刚从冷冷清清清清的衰落景象中抬起头来，费

孝通知微见著，说这里“大有文章”；“四访江村”后，即提出“更上一层楼”，走出江村，调查《江村经济》已经提出的小城镇问题。1983 年 3 月，以费孝通为课题组组长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学“六五”（1981—1985）规划。

他认为吴江小城镇是多子女的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之一的苏南地区，具有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摆正点与面的关系，点的深入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4 月，他带领课题组到吴江县进行典型调查，在 1 个月的时间里深入调查了全县 10 多个小城镇的历史、现状与问题。9 月 20 日，他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小城镇研讨会上作《小城镇 大问题》长篇报告，总结了典型调查的经验，论证了小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继后，小城镇研究逐步由苏南到苏中，进而到苏北，覆盖江苏全省，影响到全国。《小城镇 大问题》相继在《新华日报》和《瞭望》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小城镇发展和中国城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 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费孝通又回访故乡吴江，第 15 次访问江村，相继考察盛泽、北厍和芦墟等小城镇，相距《三访江村》近 10 年。他在考察后发表的《吴江行》一文中回溯了故乡 10 年的巨变，描述了吴江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工业发达、创汇力强，国民经济已接近小康目标之后，着重阐发了吴江坚持以农为主实现农副工三业良性循环，推行培育政策振兴丝绸之府，狠抓流通形成贸工农一条龙，左右开弓同时开辟国内外两个市场，加强横向联系扩展经济发展空间的轨迹……他深情地说：“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 10 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的故乡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结实的，因为它扎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 10 年，就进入 21 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自此以后，特别是在新世纪里，吴江的综合经济实力更是提速提质地前行，由“一镇一品”向“区镇合一”发展，2013 年城镇化率已达到 64%。

30 多年间，我目睹着吴江松陵镇和其他乡镇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费孝通生前的许多建议已经被实践，并不断创新。吴江结合自己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说它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县域“标本”。“江南何处好，乐居在吴江。”吴江真是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可爱。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也就是还学问于人民。他践行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广泛而巨大，有目共睹。同时，他总是不忘故乡的恩赐，在《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的开篇就言道：“初访江村是我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碑。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来，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日子子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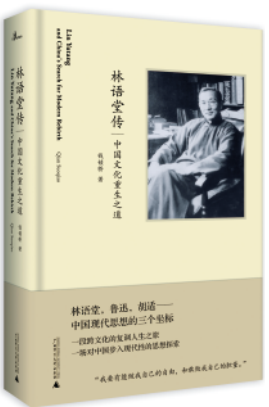
小城镇研究之初，费孝通就明确其研究是长期的，进入新世纪后他嘱咐说，小城镇这个课题还可以一步步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2003 年 12 月 7 日，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 20 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他最后告诫说：“我们从小城镇开头，只不过提出了一个问题，但绝不能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不断向前走，把这个过程分析出来，记录下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年纪大了，力量不够了，希望通过这个纪念活动，能促进今后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下去。”吴江故乡人的脚步没有停留，从不满足，不断在实践，在创造，在总结，向着未来。

2005 年 4 月 24 日费孝通辞世后，《中国青年报》在悼词中说：“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这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共同心声。吴江松陵镇公园的费孝通墓碑刻录着他留存的文字：“逝者如斯，‘而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这是费孝通一生乡土情怀的概括和升华。

费孝通指的乡土既是自己家乡——吴江，也是指自己的祖国。人有自己的逝去，自然规律不可逆。但人一代代地劳动生产、生活，把时间变成了历史文化积累的基础，薪火相传，留住了岁月流光。人文世界超越于个人生死，并没有因一个个人的逝去，而消失。费孝通坎坷一生，他扎根乡土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是不怕时间冲洗的，他的乡土情怀已熔铸在历史文化长河之中，将永远地为后人敬仰和思念。

参考文献：《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重访江村》，载《费孝通文集》《新观察》，1957 年 第 11 期《三访江村》，载《费孝通文集》《还债》，载《费孝通文集》《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载费孝通《爱我家乡》《吴江行》，载费孝通《爱我家乡》《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载费孝通：《我爱我家》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 2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载《费孝通全集》

书话



江惠春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的道》一书，作者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锺书。

本书的自我定位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智性传记”从字面上讲，就是写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史。或许“智性传记”就像林语堂写的传记那样，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所以读完这部传记，我们应该就知道林语堂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的。

钱锺桥教授的跨文化履历对林语堂研究有很大的帮助，通过行思结合，详尽地描述了林语堂一生跋涉文山史海的历程。他将自己所思所想涵盖其中，有对林语堂的成长回忆，在对其求学、回国和海外生活经历的回顾中，揭示了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的真正价值所在，也向世人再现了“幽默”“性灵”的林语堂。本书兼具文学性、思想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开篇，作者就写明了林语堂是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然而遗憾的是，对林语堂一生著述、评论、传记研究还远远不够。或许也因此，作者在本书中主要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以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尤其是以中美知识交往史为背景。这部林语堂“智性传记”旨在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块砖，或许还有助于中国和世界重启“新的文明”之探索。

作者在这部传记的第一章（作为引言）中提到，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林语堂在晚年回忆自己的知识旅程时，仍视胡适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将林语堂与鲁迅、胡适并称“三足鼎立”，可以说是林语堂研究的一大亮点，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扩展到“三足鼎立”。三人的文化遗产是 20 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

书中还有一个让笔者记忆深刻的情节。在语言学上，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文学上，林语堂翻译《红楼梦》，他通过翻译实践，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基本一致。但作者也写明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完工了，只是一直未能出版，其手稿目前在日本被发现。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历经几代人的研究，《红楼梦》从未被开掘殆尽。林语堂甚至警告“疑古”“过火”，传统文本很容易被“怀疑”掉，如果一味对传统文本采取虚无主义式任意“怀疑”的态度，传统文化便只剩下废墟一片。可以说，林语堂的态度很有启示意义。钱锺桥教授也在书中阐明，人们常以“学贯中西”评价林语堂，这是做学问很高的境界。确切地说，想要真正理解林语堂，若能从中西两个世界的活体验，对研究林语堂至关重要。而钱锺桥教授本人恰好具备这样的体验，让我们能从更深层次了解林语堂的“学贯中西”。

一如书中所言，林语堂不光是在自己散文中推崇童心不灭、自然率性，而且也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为了理想和信念参加 1927 年的“大革命”，期盼一个年轻的中国得以重生。对林语堂来说，20 世纪 20 年代是他一生跨文化旅程中最重要成长期。在这阶段，他以海归语言学家的身份在文学领域初露头角，还担任北大英文系教授，并和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周氏兄弟为首组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也就是“语丝派”。这也是钱锺桥教授笔下的林语堂，在“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情怀的呈现。20 世纪 30 年代，《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林语堂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抒情哲学”，为他带来巨大的成功和荣誉。

后来，林语堂赴美。他和赛珍珠的交往改变了他后半生：林语堂、赛珍珠和华尔希组成绝佳的“三人组”，他们的合作也是 20 世纪中美文化交往的一面镜子。晚年的林语堂在台北定居，他的三个女儿中，如斯和太乙都成为作家，相如则是化学教授。林语堂最终在台北去世，遗体安葬在寓所的后花园，享年 80 岁。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这部传记的史料搜集工作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钱锺桥教授为了找到一个“中国声音”，在多次游历的基础上查阅大量史料，还到台北林语堂故居做了一个多月的“驻馆学者”，只为寻绎林语堂的心路历程，最终成就本书。书中还将中英文版《林语堂全集》书目作为附录，方便人们阅读查找。

钱锺桥教授知古鉴今，用充满哲思及饱满有力的笔触，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并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探索中国现代之路，仍具备可用的资源与活力，引发人们思考和寻味。

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